

# 质疑与追寻: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创作中的原罪与救赎

王曼利<sup>1,2</sup>

(1.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5)

**摘要:**一切宗教,包括东正教,就其思想的立论核心而言,“人”是基本立足点。无论百年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历史、范式、方法和语汇如何发生变化,从主题研究而言,东正教一直通过宗教教义影响他,通过宗教氛围感染他,使他形成了独特的宗教体验,使其创作始终未能超脱对“人”的观照与凝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关注人的罪恶和拯救。神-人应是和谐的关系。人有自由意志,但人的自由意志却导致了罪和恶;要获得神-人关系的再度和谐,就要正视罪恶和苦难,进行自我精神惩罚;神人是拯救人类的爱的形象。应该说,对“人”原罪与救赎的回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东正教的视野中完成的。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意志;原罪;精神惩罚;神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7)03-0049-08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3.006

王曼利. 质疑与追寻: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原罪与救赎[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3):49-56.

## Questioning and Pursuing: the Original Sin and Salvation in Dostoevsky's Literature

WANG Man-li<sup>1,2</sup>

(1. Faculty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Faculty of Humanities,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710125,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all religions, including Eastern Orthodox, is human being. No matter what changes occurred in history, paradigm, method and vocabulary on Dostoyevsky's research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Russian Eastern orthodox influenced and disseminated Dostoyevsky through religious doctrine and religious atmosphere, his thinking on human being was completed in the context of Eastern orthodox culture. What Dostoyevsky concerned about was sin and salvation in his whole life. God/man should keep a harmonious binary relationship. Human being has free will, but evil and sin are

收稿日期:2017-0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EF152)

作者简介:王曼利,女,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长安画派研究。

caused by irrational use of free will. In order to obtain the re-harmonious binary relationship, human being must envisage sin and suffering, and give themselves inner self punishment. The Man of god, Jesus Christ, is the perfect one who could save human beings. Dostoevsky responded original sin and redemption in the orthodox view.

**Key words:** Dostoevsky; free will; the original sin; mental punishment; man of God

历史上,罗斯是斯堪的纳维亚与拜占庭、西欧与东方阿拉伯之间的交汇地带,是一个半欧半亚、非欧非亚的国家。基辅罗斯在9世纪上半叶基本形成,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将基督教带入罗斯的同时,拜占庭的文化和艺术也通过“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得以传入。俄罗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东部教会在内外交困中向黑海北岸的自我主动拓展,拜占庭神学是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重要的直接根源之一,二者的关系是不言而喻却十分复杂的。拜占庭神学是俄罗斯正教神学的外在根源,对前者的接受和改造是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主动选择的结果;拜占庭正教在俄罗斯的迅速与深入传播则更有赖于俄民族的宗教性与拜占庭正教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对俄罗斯民族思想产生影响的固然还有西方神学和希腊哲学,有古罗斯民间的多神教信仰和风俗,但东正教因其民族性格的极端性、赎罪意识和自我贬抑相契合,成为影响俄罗斯民族信仰最主要和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对生命的意义、上帝、永恒、恶等宗教问题的焦虑,与俄罗斯人热爱哲学思考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又通过文学和艺术表现出来。俄罗斯文学从公元10世纪开始到苏联文学之前,东正教的影响始终或隐或显伴随其中,从未消失。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作家,如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中都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情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真正的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民族是唯一体现上帝意志的民族,本民族肩负着神圣的东正教使命,俄罗斯是真正的“第三罗马”。这种思想使俄罗斯文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救世意识。刘小枫认为,19世纪以来,现代俄罗斯正教神学思想的言说形式之一是宗教文学的论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为代表。诚如刘小枫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充满了东正教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哲学和文学化了。至今,人们仍难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一个终极定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核心始终是“人”,始终是对“人”原罪与救赎的观照。19世纪彼得大帝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在东西文化夹击下艰难生存,在现代性思想观念的冲击下信仰断裂,人民和知识分子精神上无所适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创作提出了拯救俄罗斯精神的方案。也许这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方,却无疑是一记令人清醒的当头棒喝。

##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神—人关系论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乃是对于我之所以为我的思量和承认”<sup>[1]</sup>。宗教“与其说是理智的选择不如说是情感的皈依,一种宗教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经验的感受”<sup>[2][23]</sup>。人类出现后,伴随个体独立而来的是孤独无依感,对宇宙的茫然无知使人满怀恐惧,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和情感的依靠,于是,神便产生,宗教体验也因此产生。《旧约》与《新约》赋予了人很高的地位,是为了满足被压迫的犹太人以及一切希望得到拯救之人的情感需要,原初基督教是为人而设的,从宗教的最初状态而言,人和神应是和谐的关系。

教会的日益世俗化和对基督教神学教义的任意诠释、妄加利用是神-人二元关系异化的肇始,宗教经验的随之变化是神-人关系异化的助力。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到中世纪末,教会的主要教派和世俗政权结合,对异端分子进行残酷迫害。中世纪教会将基督教教义的消极成分任意发挥,宣扬君权神授、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宣称人对苦难的忍受和自我的贬低是获得拯救的前提。从这种新的宗教

经验出发,人极度贬低自己,无限抬高上帝。此时,人固然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获得了安全感,但却失去了独立自主性,神-人关系发生扭曲,神变为超自然、超人类的超越性存在,人被异化为匍匐在上帝脚下的生物。神是主动施爱者,人为被动受爱者,神-人关系并不对等。

人的信赖是宗教的基础,神本为人所造,人却赋予神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宗教的基础和对象,神学就是人本学,上帝不过是人本质的虚幻反映,宗教是人本质的异化,克服这一矛盾的途径就在于把宗教颠倒了的东西重新翻转过来。任何宗教都应是“复活”的宗教,当剥除教会的世俗化目的和少数教会人士的别有用心后,宗教的最终目标应是神-人关系的再度和谐。

罗斯受洗后近一千年中,宗教和政权与俄罗斯社会须臾不可分离,呈现政权与教权此消彼长的历史态势。在俄罗斯,沙皇不仅是世俗政权的最高首领,同时是君权神授的代表,是被神化了的君主,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历来是官方教会,御用性质强烈。俄罗斯东正教的神-人关系,实质为君-民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已扭曲了原初基督教对人的重视。然而,俄罗斯在罗斯受洗后开始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却遭遇了彼得大帝改革的夭折和封闭落后中的“混乱时期”,因此精神领域亟需一个引导力量,教会和东正教便承担了这一角色。

《圣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幼时的识字课本,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上帝就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约伯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尤为深刻,乃至几十年后再次阅读时,他仍激动得热泪盈眶。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判处假死刑一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冲击极大。流放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读物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们赠送的《福音书》,这本书一直伴他直至死亡来临。四年的苦役和十年的流放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惊讶地发现罪大恶极的犯人仍信仰上帝,甚至因深恐被上帝抛弃,他们在祈祷时表现出比普通人更强烈的庄严肃穆感。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前后期的过渡性作品。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的创作是追随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手法,是有道理的;但即使是早期的创作,其作品也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全盘摹写,而已具有更高的、宗教哲学意义上的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表现人的心灵和精神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俄罗斯文学和东正教宗教经验的不可分离是他以创作表达宗教救赎的核心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生的问题是:“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他对上帝的质疑源于神-人关系发生了扭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神-人关系有三种形态:人信上帝、人即上帝、神人。“人信上帝”这种关系中,人渺小无依,因而渴望上帝,上帝却对人的苦难背过了身躯。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质疑上帝的缘由。“人即上帝”主要在一系列被称为“思想人物”,如伊万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等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他们与斯塔夫罗金之流不同。斯塔夫罗金经常贬低别人的价值,对他人的体面和生命任意践踏和蹂躏,而伊万和拉斯科尔尼科夫试图背离甚至充当上帝则源于无法漠视人类苦难。“人信上帝”到“人即上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不断深入,是他对上帝的绝望反叛。“神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推崇的一类形象,他将拯救希望寄托在基督原型人物上:佐西马长老、梅诗金和阿廖沙等。这三种神-人关系的设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矛盾思想的绝佳注脚:陀思妥耶夫斯基固然怀疑上帝,但从不否认上帝;固然责难上帝,但从不放弃渴求上帝。神人的形象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神-人和谐关系的思考,他认为耶稣基督是纯粹的“神人”,是“人类永恒的理想”,是“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sup>[3]</sup>。上帝使独子耶稣道成肉身救赎世人时,神-人关系将再度和谐,神-人再次融合。

19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转型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亲眼目睹社会发生剧变,人民因生活动荡而对上帝产生质疑乃至否定,但最令他痛彻心扉的是,很多人在干着无可置疑的坏事时,却认为自己不是坏蛋!人性的复杂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惊讶与困惑,他没有通过系统的哲学理论来破解“人”之谜,而是将这种思索凝结在艺术创作中,完成了对神-人关系的追寻。

##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自由意志论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和人的命运问题首先是关于自由的问题,他是在宗教中理解自由思想的,并给予了自由前所未有的辩护。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德米特里、伊万、拉斯科尔尼科夫等,都具有不确定性,个性中都有未完成的、不可决定的内核。这实与作者强调的自由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复调也是作品中人物自由表达(不受作者干涉)的结果。自由是中性的,具有导向任何方向的可能性,作为上帝的造物,人可以选择爱上帝,也可以选择不爱。人的本质特点之一是具有自由思想和意志,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崇的,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人又是非理性的,与非理性相比,人的理性无比脆弱,所以人经常会被魔鬼所利用,走向恶的道路。《白痴》中精致的东方瓷器穿插全书,这些包括陶瓷茶杯、陶罐,特别是被梅诗金公爵打破的中国花瓶在内的瓷器总是与人脆弱的生命相关<sup>[4]</sup>。《宗教大法官》中,宗教大法官对耶稣说人是软弱无力的,是一群只要给面包就会闭嘴的生物,有时他们宁可放弃自由而寻求权威的庇护,宁愿跟在权威者后面俯首帖耳也不愿好好地运用与生俱来的自由。人最可怕的劣根性在于人向往自由,但获得自由后,人又几乎立即会产生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试图重新依附权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人类发展的悖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表现人失去自由的各种情形,如禁闭、生死抉择,如对犯罪与否的选择。《穷人》中的杰符什金,处在社会最底层,爱恋着纯洁的少女瓦莲卡,但他的精神自由最终却被现实贫困无情夺走。即使如此,杰符什金仍没有将这一切归罪于上帝,仍然无比地热爱着上帝。《死屋手记》中的囚犯滥用自由,杀害了他人乃至孩子的生命,他们对自己的罪恶熟视无睹,对自由的漠视让他们付出了被剥夺自由的代价。但这样的法律惩罚并非有效,上帝的惩罚才是他们内心真正畏惧的。《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在使人生或死的选择中犹豫。杀了高利贷老太和她善良虔诚的妹妹后,以为可以成为拿破仑的拉氏却觉得生活被拦腰剪断了,自己被隔绝了。拉氏选择杀人,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如困兽般未曾检验的超人理论,在痛苦煎熬后,他最终选择了以他人性命来验证此理论。拉氏的选择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正确的途径,事后拉氏的精神折磨也正源于他没有运用好人的自由,他也因此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自由。《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对阿廖沙的质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章节。伊万对人类,特别是孩子的苦难充满了同情,他用搜集来的苦难质问阿廖沙,并表示自己并不是不信仰上帝,只是无法接受漠视无辜儿童苦难的上帝,所以他将通往天堂的入场券还给了上帝。身为俄罗斯人的伊万,注定无法摆脱东正教根深蒂固的影响,最后在信与不信的挣扎中疯狂。伊万是理性的,但却放弃了信仰上帝的自由。

若向前追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由意志的思考可与《圣经》遥相呼应。《旧约·创世纪》中上帝在伊甸园中种植了善恶树,他曾警告亚当和夏娃此树的果子万不能吃,因为吃了必死无疑。既然会“必死”,上帝为什么还要种果子,冒有人误食的危险?上帝的警告其实隐藏了亚当的自由选择:亚当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吃和不吃的后果当然不同:吃,就要受惩罚;不吃,就永远无法真正认识自己。这层含

义需要亚当自己体会。我们不禁要问:上帝既然爱人,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令人痛苦的考验?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便用树叶遮盖。善恶树的果实可让人“心明眼亮”,说明亚当在未吃果子前是懵懂无知的,他对上帝的服从可能是盲从而非真意。在偷食禁果后,亚当和夏娃及其后代遭遇了许多苦难,人类却更加深刻体悟到神-人关系的真谛:上帝需要的是自由选择信仰和追随他的人。也许,从上帝种下善恶树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和预料中,上帝给人选择的自由,人可以自由地相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犯罪,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最终皈依上帝。正是在这自由中,人类的精神光辉和人性的伟大不屈展露无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常被错误地用来讨论罪恶的话题,Toby Betenson 却认为伊万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因此,他不应是我们讨论无神论的对象,而应将他视作一个特别的、强健的非认知无神论形式的代表人物<sup>[5]</sup>。伊万受科学理性的影响,认为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以做的,并有意无意将这种思想灌输给斯梅尔加科夫,后者实践了他的理论,杀死了他们共同的父亲。德米特里承认弑父罪后,伊万却陷入了精神疯狂。伊万背离了上帝,他的背离却是对上帝的一种追寻,因为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是不会被“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逼疯的。伊万的痛苦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不同的是,作者是愿意并热切期盼上帝的。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讨论《安娜·卡列尼娜》时曾表示,人的精神规律是不明了的、神秘的、不确定的。人精神规律的特性源于人的自由选择。无论自由选择的导向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注重人的选择自由的,他提倡的是对善的选择而不是对恶的追随。

###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罪恶论

罪是人类社会中几乎无可避免的行为,罪感意识源于奇特的人类本性,产生的原因很微妙,与人类各种抽象的情绪有关,基本的一种来源是人主观努力与客观结果之间的落差。具有强烈宗教情怀和入世精神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托尔斯泰,身先士卒、悲天悯人却无法拯救人民甚至无法真正理解人民时,会自然地产生一种负疚和赎罪意识,这种心态与基督教信仰中的“原罪意识与民族的苦难意识融合在一起,共同建构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sup>[6]250</sup>。

因罪产生恶,或因恶产生罪,此二者均与人的自由意志紧密相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没有自由意志便没有恶(当然也没有善,即自由意志是善与恶的内在根源),而且,“藏匿于人类中的恶比包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深得多,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sup>[7]244</sup>,恶在基督教看来是一种人性的不完善,是人性固有的,人在自由意志中给恶留了位置,在人的默许下,恶才得以滋生,罪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是非理性的,并且非理性的影响往往大于理性,这是导致罪与恶的原因。这也是宗教大法官所推崇的理论:很多人并不会使用耶稣基督用鲜血换来的自由,相反,他们更相信撒旦的权威、奇迹和神秘。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不幸在于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人面对诱惑时歪曲了所携带的神性,导致了恶。人性具有神性和魔性的二重性,神性和魔性处于此消彼长的斗争中,斗争是常态的。人往往忽略或故意视而不见身上的神性,顺应魔鬼的引导而导致了恶。这里所说的“恶”不仅仅指法律意义上的恶,更包含了宽泛的东正教的文化涵义。恶又引发了罪。罪代表人与上帝之间纵向关系的破裂和人与人之间横向关系的继而破裂,罪是人类选择了与上帝对抗,要超越上帝给人设定的界限。罪的本质是人违背了和上帝的约定,破坏了神—人关系。有了罪,接着就会出现罚。恶—罪—罚,是相关的几个链

条。与罪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关注罚,而且这种“罚”更多的是主人公精神上的自我惩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善恶不绝对对立,恶往往产生于善,善又存在于恶中。这一价值观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人物时没有简单化,他笔下的人既非天使也非恶魔,既不高尚也不卑劣,而是兼具善恶两方面特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遗传了卡拉马佐夫家族荒淫好色的特质,但同时又真诚善良;即使基督似的人物阿廖沙,也承认自己身上流淌着卡拉马佐夫家族卑劣的血液。《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名字本意便是俄语“分裂”之意,既热情善良,又卑鄙自私。拿着母亲的养老金和妹妹出卖尊严换来的钱,拉斯科尔尼科夫既惭愧又内疚,见到亲人时却又拼命压抑自己的情感,对母亲和妹妹表现得极度厌恶。虽然拉斯科尔尼科夫因高烧犯案留下了很多证据,但警察始终无法将他抓捕。对他来说,坐牢不可怕,绞死不可怕,可怕的是超人理论的失败。《罪与罚》大篇幅描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的心理活动,他承受了极度痛苦的精神惩罚,所以索尼娅说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不幸来自他对世界公平和上帝公正的追求。很明显,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为我们很难用世俗的是非善恶观去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都兼有善恶对立的两面特点,神性与魔性并存、善恶兼具的人性特点为精神救赎提供了可能,这个途径就是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为人类的苦难痛苦,孤弱无依者的苦难是其创作中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1880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曾说:“如果你们亲自来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以便在落成后为人民造福……为了这件事却必须、不可避免地必定要使一个人,总共是一个人,受到痛苦……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但受到残酷而野蛮地摧残的小人物的痛苦的基础之上,人们会愿意接受你们给予的这种幸福,而且在接受这种幸福以后永远感到幸福,你们能有这种想法吗?哪怕只有一分钟。”<sup>[8]</sup>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能忍受这样一座人类的命运大厦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苦难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苦难的渴望不仅源于不幸和灾难,更是人灵魂的需要。在俄罗斯人民的意识里,苦难对心灵有一种净化作用,苦难使人离上帝更近。何云波在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时认为,托尔斯泰信仰的是一种理性化色彩的宗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信仰往往伴随一种巨大的激情,在这种激情中,他产生了一种宗教快感,这种宗教快感是“在对上帝的忏悔中获得一种受虐快感”<sup>[6][67]</sup>。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苦难充满了理想化色彩:苦难的根源是恶,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是必须的,它是恶转向善的中间桥梁,是人用以清除恶和升华灵魂的必由之路。故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苦难和拯救联系在一起,只有甘愿为自己和他人忍受苦难,拯救才有希望。对苦难的理想化正是植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

####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救赎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一个炼狱,炼狱中灵魂获得拯救的前提是忏悔的自觉性和惩罚的自发性。这种忏悔和惩罚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出自内心对善和希望的信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关键是永恒的信仰,在罪与罚之后,作者“迫使”他的读者理解小说的神学思想,而不是过分简单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sup>[4]</sup>。人固然有偏向恶趋近魔鬼的倾向,同时人的神性也使人有重新返回伊甸园重新获得上帝爱的渴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魔鬼和上帝较量的场所就是人的心灵,心灵历经烈火的淬炼得到复活,最终走向天堂。

1878—1881年,被认为是独特的俄罗斯神学奠基人的索罗维约夫开设了《神人类讲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前往聆听。神人和神人类思想是索罗维约夫神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俄罗斯宗

教哲学和神学的主要内容”<sup>[9]</sup>。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伟大的女性可以拯救世界,他使女性神圣化了。这样的女性被索罗维约夫称为“索菲亚”,是上帝的身体和基督的标志。神人和神人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毫无影响,他作品中的神人和神圣女性均可视为和谐神-人关系的桥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从魔幻世界向启示世界的飞升,经由的中介就是担任拯救角色的人物群像,集中体现在基督式的神人身上:圣母式的女性、中介新娘、“白痴”梅诗金、佐西马长老等。赫尔曼·黑塞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方法的影响,二者都认为“新人”将取代那些受教育却无法用知识来解决自己困境的人,通过揭示爱的本质、什么是“积极的”爱,这个新人会将俄罗斯和欧洲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终极的和谐一体的信仰是黑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基础,他们认为给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困境指出一条出路是他们的职责。这个新人便是基督耶稣,通过这个新人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完美人格和人的理想出路。

1854年二月下旬,流放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冯维辛娜,说他是“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历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在偶尔宁静的片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了宗教的信念,那就是“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sup>[7]297</sup>。真正的人类是自由的人类,但如何保证人类走向统一,而不是分散?用什么让人类取消敌视和仇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基督才是完善的人的形象,是灵魂无限信仰的对象,才是人类聚合和友爱的使者。

即将逝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自己是“以完全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sup>[7]390</sup>。对这句话的理解要置于正教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此话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1881年的笔记本中,包含在一组短论中,短论的中心思想是如何理解正教与人民。在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俄罗斯人民 = 正教,而俄罗斯人民 = 人民,所以人民 = 正教;人民 = 正教,人民 = 人,所以人 = 正教。按照这种逻辑,陀思妥耶夫斯基“人身上的人”即是正教人类学中具有“神性”的人。

人的神性是潜在的,“人因此而成为悖谬性的一种存在”<sup>[10]</sup>。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不懂得正教就不懂得人民,就无法弄懂人的秘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主人公经常面临的选择是非此即彼的,是坚持对上帝的信仰而恢复身上与生俱来的神性,还是拒绝和背叛上帝而扩张为“人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肯定前一种选择而否定后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将人物放在极限的环境中,他关注人的灵魂,作品中的艺术事件不过是传达人物思想的载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独特性和艺术价值正在于表现人物思想所达到的深度,这种深度体现在:人如果仅仅意识到无限自由的诱惑,而认识不到他所携带的神圣使命,一旦进入罪孽中,人身上潜在的神性就会提醒人和对自我进行惩罚。

人与人、肉体与灵魂本应是神性的和谐,一旦和谐遭到破坏,恶便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由路上塑造了一些反面人物,但他一直在努力寻找他们身上的神性。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拯救只能来自内部的精神挣扎和自我忍受苦难,虽然这些人丧失了实现上帝类似的能力,但上帝植入人内心深处的神圣种子永远存在,对此的记忆将伴随人走完整个个体时间。

索罗维约夫在1881年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爱的是作为上帝的人类的我们,“他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sup>[11]</sup>,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的人是上帝和神人,爱和宽恕中饱含了上帝和基督的理想。

十九世纪俄国的社会现实将作家们强行推去面对人类生活的终极问题,不管它的文学调门是怎

样的现实主义,俄国小说大多都是形而上学的、充满哲学意味。不从宗教和哲学的视角去解读俄罗斯作家,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无法理解其真正含义的。相信基督,按照基督的教导生活,就可以复苏神性,就能获得拯救,这就是救赎的真谛。

## 结 语

“俄罗斯作家对宗教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拯救及其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寻求,从而构成一种宗教精神。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生都在怀疑上帝的存在。但他在寻求自身精神的超越与人类灵魂的拯救时,他又不得不依赖上帝”<sup>[6]259</sup>。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原罪与救赎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基督教教义的“挪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人类全部的恶,也相信人类全部的善。“一旦文学家拥有宗教信仰,宗教语言就成了文学语言”<sup>[2]30</sup>。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观点是通过文学这门语言表现的,因此,对他“人”的研究就必须深入到俄罗斯正教文化的语境中方能寻得其文化根源。

宗教包含着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哲学思辨和宗教玄思已成为该民族心理深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特点使他们的文学创作既有对现实清醒的批判,又有超脱的精神追求。中国当下也有许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作家,如莫言、陈忠实、贾平凹、余华等,他们同样通过创作关怀着中国转型时期中的人性分裂与精神阵痛,讲述着自己对精神、希望和信仰的思考。我们可以说,拥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拯救情怀的并非只有少数人。

### 参考文献:

- [1] 费尔巴哈. 宗教的本质[M]. 王太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
- [2] 葛兆光.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 [3]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M]. 冯增义,徐振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91.
- [4] LISA W. Treasures in earthen vessels in Dostoevsky's the idiot[J]. The Russian review,2015,74(4):624-641.
- [5] TOBY B. Ivan Karamazov is a hopeless romantic[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2015,77(1):65-73.
- [6] 何云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 [7]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 冯增义,徐振亚,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8]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M]. 李鸿简,刘季星,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12.
- [9] 张百春.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88.
- [10] 王志耕.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3.
- [11] 弗拉基米尔·索罗维约夫. 神人类讲座[M]. 张百春,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13.



(责任编辑 杨文欢)